



# 援建高原的“模范夫妻”

□ 李景

3年前,玉树地震、同胞受灾,安宁的小城,满目断壁残垣。

3年后,援建落幕,百姓安居,无数援建人,重铸了玉树的新生。

施工现场满身尘土,却散发着劳动之光;一年四季,两套工作服,却透着工人之美。

在这支队伍中,有这样两位工人,他们来自中国电建集团玉树重建现场指挥部的第一工区。男的叫康明,女的叫张玉娟。他们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夫妻颀颀;他们共同进退,携手为灾区重建家园。玉树不仅让这对“模范夫妻”加深了感情,更让他们经历了无数严峻的考验。

## 在一起

两个人只要能在一起,再苦也心甘

夫妻俩自打坐同桌开始,就感情深厚、形影不离。从甘肃水利水电学院毕业后,一起进入中国水电搞技术、做工程。分配到水电四局后,他俩又先后在黄河万家寨、长江三峡、黄河拉西瓦进行水利施工。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当时,已是技术骨干的康明接到去玉树“建学校、盖民房”的救灾任务,便积极报名参加援建。7月10日,当康明登上百废待兴的玉树高原,面对一片废墟和无助的灾民,他握紧双拳,决心和援建大军一起重建家园。自此,便一头扎进了抗震房屋的建设之中。

丈夫到达玉树的第九天,张玉娟就请缨调岗,从黄河畔赶到了丈夫身边。

“其实也没想太多,就是希望我俩好好在一块。”问起追随丈夫的奔波辛苦,张玉娟几乎脱口而出。“其实当初面对玉树4200米的海拔和艰苦的条件,不少同事都害怕援建任务落到自己头上,但我和康明从毕业就没分开过,他到哪我就到哪,而且康明的身体不好,我必须过来照顾他。”

为了支持丈夫,妻子决定放弃老本行改做经营,“还是因为家庭的考虑,毕竟改做经营,能让我们俩分配在同一个项目上嘛。”张玉娟说完有点不好意思。

“但刚到玉树,比新工作更难适应的是高原反应。好几次缺氧,我的脑袋都疼得像要爆炸一样。”妻子话音刚落,康明就在一旁补充起来,“这儿不仅缺氧,夏天紫外线还强呢。工地上的人,脸都会被晒得像裂开的土豆一样,皮会一层层地掉,摘了墨镜和头盔,脑门儿和眼圈附近会留下一圈白印。”康明半开玩笑地说边在脸上比划着,“这地方刚来的时候还行,到了第二年会感冒,第三年就经常感冒,如今不打针输

液都扛不住了。唉,我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记者在玉树采访的几天也深有体会:头疼缺氧、胸闷气短,几日程况且如此,常年驻守的工人们更是不易。

“看来玉树的确折磨人啊,瞧你现在晒得这么黑,以后别说是我同学,你可比我老多了。”前些时,同学的一句玩笑,成了夫妻间打趣的话柄,“来玉树前,我的皮肤还挺好、挺白的,但现在康明都笑话我,说这几年我变得比退休的人都老了。”

虽然是开玩笑,但看得出妻子并不后悔追随丈夫上高原。对她来说,除了援建的光荣和责任,两个人只要能在一起,再苦也心甘。

## 有默契

看着一幢幢藏式新居拔地而起,夫妻俩觉得很值

“我俩的工作算是量价结合吧,康明搞技术、施工、方案、验收,我做的是工程预算和报价,正好他能给我提供数据和方案。”张玉娟讲解着两口子工作上的联系。

“那会儿初来乍到,对藏式建筑风格一点儿也不懂,什么帮安、干戈、格桑、东玛……听都没听过。到这来都是边学边干

的。”两口子平时一有空就钻研,藏式建筑的门道着实让两口子摸索了一阵。

谈起工作心得,两人分别翻出了日记。默契的是,3年来都各记了8个大本,加起来足有2尺高。而康明不仅仅记录自己的工作,有一次,他还把妻子工作中的问题写进了自己的日记。“是啊是啊,有时候他还在那本上给我提意见呢。”张玉娟笑着说。

如果要问工地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康明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跟业主打交道最难。”

因为建房之前就已确定了住户,因此虽然盖了几百个民房,实际面对的却是上千个业主。

“出于尊重藏式的习俗,这儿的房屋并不进行统一规划,在面积固定的条件下,户型根据每个业主的意见单独设计,所以施工中每个业主都有自己的想法,特别难办。”康明对此颇感棘手。

对此,康明不禁感慨,“以前干水利工程只要懂专业就行,现在盖房子还要会跟人沟通。”而张玉娟对老公的苦恼也深有感触,“我们不懂藏语,很多时候解释不清的,还得想尽各种办法协调,真是头都大了。”

好在有付出就有回报,在不断的沟通协调中,下西同镇的民房一幢幢拔地而起,老乡们也可以住进坚固的民房了。

“房子建的还真是好!”管委会的白玛对这些民房赞不绝口。供电所的仁青才人在一次闲谈中也告诉夫妻俩,“刚才去山坡

上架电线,俯瞰玉树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咱这房子建的可真漂亮啊。”还有位更热情的老乡,一定要送只藏獒表示感谢,康明赶忙婉拒了。

除了民房以外,康巴风情街、红卫滨水休闲区、第三完全小学、第二民族中学等康明夫妻主管的项目,都为当地的教育、商业提供了高品质的房屋。看到这些,夫妻俩觉得很有价值。

## 盼团圆

虽然工作繁忙辛苦,小两口偶尔也会擦出感动的瞬间

来到康明12平方米的工区住处,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办公室。“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基本是混在一块的,因为随时都有工作,所以把住处和办公搁在一起也方便。”康明说。

由于手上同时负责多个项目,每个项目都要布置工作和总结汇报,另外还要现场盯施工,因而加班到深夜、凌晨都是家常便饭。虽然工作繁忙辛苦,无暇顾及生活,但这小两口偶尔也会擦出感动的瞬间。

“我平时爱吃水果,有一次无意念叨了两句想吃水果,结果当天回来就发现桌上摆满了苹果和梨,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幸福。”说起这段经历,张玉娟一直很感动。

而康明的幸福则更加简单,“我不是经常在工地吗,老婆每天都会往工地上打‘查岗’电话,每天一问‘你啥时候回来?’就这一句,听了我就很满足了。”

但谈起遗憾,康明沉默了一下,“没法照顾女儿,是我俩面临的最大问题。”说起留在老家甘肃的女儿康舒月,夫妻俩满心愧疚。

“去年暑假,孩子来玉树住了10多天,我们工作太忙也没陪她玩,她临走时说,再也不想来这了。”张玉娟只能苦笑。

“孩子13岁了,有自己的心事和想法,需要和她多交流。虽然现在援建结束了,但清算工作还有很多资料要整理,我还得在这留些日子。”张玉娟无奈地说。

一次,女儿在电话里对妈妈说,“这几天我特别不开心,我也不愿意和姥姥姥爷说,实在闷得无聊了,我就一个人去大街上转悠,一直转到很晚,就是不想回家。”

一想起那次通话,张玉娟的心就揪在了一起,“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去陪孩子,12月初一定回去!”

如今,玉树援建工程圆满落幕了。希望这对援建夫妻早日完成善后工作,好好回家睡个踏实觉,看看老人,陪陪孩子。

随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加快,海上航线日渐繁忙,各类险情也有增多的趋势。作为一名海上救助者,我深知身上承担着国家海上生命、财产救助和维护海洋环境免受污染的责任。

在近20年的工作经历中,我救助了数以千计的海上遇险人员,挽救了数以亿计的国家资产,避免了多次海上难船泄漏污染海洋事故。

那是2010年8月10日18时许,“浙洞渔429”轮在温岭石塘南面约3海里处因船体大量进水下沉,船上9人全部落水,生死未卜,急需救援。当日19时20分,我所在的“东海救112”轮接到命令后立即备车起锚,火速赶往现场搜救。由于夜间视线差、渔网多,搜救工作存在困难,经对搜救现场情况评估后,我果断地协调现场其他救助力量采取扩展搜寻,次日凌晨0时18分,我驾驶着救助船首先发现2名遇险人员并迅速救起,0时27分又紧急救起2名遇险人员。随后,另外5人也相继被其他过路船救起。

仅仅时隔20多天,在2010年8月31日17时42分,我所在的“东海救112”轮又一次接到救助指令: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南麂岛客运班轮停航,滞留南麂岛的246名旅客中出现了3名病危游客,亟须转运到岸上医院救治。接到指令后,我带领着团队,顶着9至10级大风,连夜前往南麂岛,经过9个小时努力,于次日凌晨2时许将包括3名病危游客在内的22名游客安全地转移到洞头,并送交当地120妥善救治。

作为一名救助船长,多年以来,我经受了无数次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我也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全部奉献给祖国的海上救助事业。每次险情之后,回想起来,也难免后怕。然而,历经海上风浪,我心中的使命感反而更加庄严。

# 把心放在船上 把船放在心上

徐卫国口述 李治国整理

作为一名救助船长,我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全部奉献给祖国的海上救助事业

2010年10月17日17时,浙江大陈岛以南20海里处“浙岭渔5279”发生火灾,火势凶猛,熊熊大火随时可能吞没船上10名渔民的生命。险情就是命令,为赢得宝贵的救援时间,我指挥边备车边起锚,途中安排船上各部门有条不紊地准备消防器材。当听说该渔船上6名渔民已在惊慌中跳下海时,我立即通过电话安慰惊慌失措中的渔船老大,要求他稳定人心,不要盲目跳海求生,并指导其进行自救。18时40分,“东海救112”抵达现场,为保障遇险船员的生命安全,我果断命令:施放高速救助艇靠近失火船船头,通过用绳索滑降的方式将4名惊恐之中的渔民顺利救下。人救上来后,我立即操纵“东海救112”轮接近失火渔船,使用消防炮对失火渔船实施灭火。经过5个多小时的灭火,渔船上的火势成功扑灭。

还记得在2011年6月25日至28日的3天中,台风“米雷”袭击我国浙江沿海海域,我率领“东海救116”轮船员,在台风正面袭击中,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连续执行3起救助任务,成功帮助28名遇险船员脱离险境。其中成功救助“浙普工51”桩11名施工人员的事迹,还得到浙江舟山市政府嘉奖。

危急时刻,施救命令的畅通极为关键。可在救援外籍船员时,由于语言不通,随机应变就更为重要。2011年11月30日,强寒潮影响东海海区,当天18时许,正在上海洋山港北航道东侧抛锚待泊的空载集装箱外轮“JADE”因走锚搁浅触礁,机舱大量进水,船上12名外籍船员生命岌岌可危。抵达现场后,我发现现场风大浪高且礁石林立,救助船无法靠近,在与难船船长协商救助方案时,由于现场自然条件恶劣,难船船长对我的施救建议不太配合。凭着多年的救助经验,我意识到难船随时会发生侧翻沉没的危险,于是就用各种渠道耐心地说服难船船长做弃船准备。当天半夜零时30分,难船在风浪中左右摇摆剧烈,发生失电,难船船员意识到危险的临近,在惊慌中登上了救生筏逃生。为确保筏上遇险船员的安全,我又果断地下令释放救助艇将救生筏拖离浅水区域后,操纵船舶靠上遇险船员所在的救生筏,成功救起12名遇险外籍船员,并操纵船舶做好下风安全实施收放救助艇。这开创了大风浪浅水区域救助的一个成功案例。

类似这样的救助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和战友们把海上救助工作视为至高无上的使命。我们无数次成功救助的动力,源自于我们对救助事业的理解和热爱。多年以来,我也始终践行“把心放在船上和把船放在心上”的理念。我常说,我们是代表政府履行职责,我们的行为体现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体现党和政府对海上遇险者的人文关怀。

当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需要强有力的硬件支持,还需要强有力的软环境支撑。维护海上运输安全,是我们海上救助人的责任。



# 中国芯 中国梦

王敏口述 赖永峰整理

了,被应用在LED全彩显示屏上。

硅衬底LED材料与器件技术的诞生,改写了国际半导体照明的格局。国家863专家组评价道:“它打破了目前日本日亚公司垄断蓝宝石衬底和美国Cree公司垄断碳化硅衬底半导体照明技术的局面,形成了蓝宝石、碳化硅、硅衬底半导体照明技术方案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意味着,世界上有了第三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氮化镓及LED技术路线。

技术的突破让大家欣喜若狂,然而喜悦之后,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让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实现产业化。为此,我开始为实现这项技术的产业化梦想而奔波行走。资金,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北上、南下,银行、投资机构,国企、民企,国内凡是当时认为可能拿到钱的地方,我都跑遍了。可投资人一考虑到还是实验室技术的巨大风险,往往临阵退却了。经历了一连串失败后,我们全面调整了融资思维,开始面向针对新兴产业并富有冒险精神的国际风投机构寻求合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国际知名

的金沙江风投的合伙人潘晓峰。当时潘晓峰开始关注LED产业,正在寻找适合投资的企业。我立即掏出了自己的LED方案,独特的LED技术让这位投资人眼前一亮。2005年底,金沙江开始组织专家和风险投资商考察硅衬底LED技术。由于条件有限,为了方便风投考察,我自己开车接送,一年内跑了6万多公里,平均一天跑200多公里。最终,金沙江被还处于实验的硅衬底LED技术的前景和创业人的执著所折服,终于在2006年投入了1000万美元。这笔由风投机构投入的第一笔“巨款”,加快了硅衬底LED技术的成熟与发展。

从2001年到2006年,经过5年的执著跟踪,我们的技术团队成立了晶能光电,而随着技术攻关的重大突破,硅衬底LED产业化条件已成熟。2007年,金沙江、淡马锡等全球多家著名风投机构又共同投资4000万美元,开始产业化。2009年,晶能光电小功率LED芯片于全球率先量产和投放,迅速在数码显示领域占领了优势地位。

下一步,我要做的是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让更多的企业加入到硅衬底LED产业的阵营中来

从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我进入江西省外贸厅,从事全省仪器、实验设备的引进工作。因为同为江西余干县黄金埠中学的校友,更因为直接参与南昌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实验设备的引进,我认识了做半导体照明技术研究的江风益教授,成就了江西学术成果产业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2000年,我们和南昌大学联合成立了江西省昌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江风益教授的领导下着力于LED技术的产业化研究。2004年,硅衬底LED技术获得突破,困扰众多研究者的在硅衬底上生长LED发光材料的多项世界难题被成功攻克。世界上第一批有实用水平的硅衬底LED芯片诞生